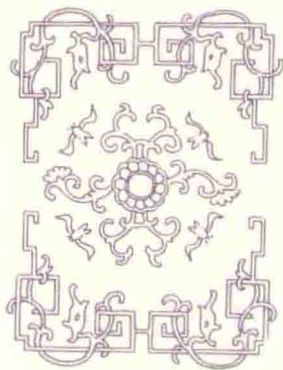


庚子勤王与 晚清政局

(第二版)

桑 兵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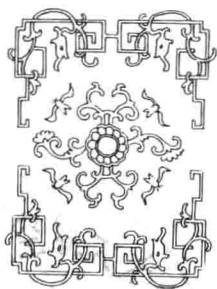


博雅擷英

庚子勤王与 晚清政局

(第二版)

桑 兵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桑兵著.—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

(博雅撷英)

ISBN 978-7-301-25123-2

I. ①庚… II. ①桑… III. ①历史事件—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K25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2589号

书 名: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著作责任者: 桑 兵 著

责任编辑: 张文礼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123-2/K·107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7315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毫米×1230毫米 A5 19.5印张 547千字

2004年4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2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目 次

绪 论	1
第一章 从救上到勤王	
——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	26
第一节 救上	27
第二节 归政	37
第三节 立储	51
第四节 保皇	59
第五节 勤王	71
第二章 保皇会的勤王谋略	80
第一节 重在两广	81
第二节 东西无常	92
第三节 秀才用兵	108
第四节 聪明反被聪明误	119
第三章 中国议会	127
第一节 组织与人员	128
第二节 正气会	134
第三节 汪、唐之争	144
第四节 自立会	154
第五节 康有为的阴影	162
第六节 各方关系	169

2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

第七节 国民发动·····	180
第四章 兴汉会 ·····	189
第一节 缘起·····	190
第二节 维新派介入·····	198
第三节 意外之果·····	205
第四节 天平倾斜·····	209
第五节 影响犹存·····	215
第五章 革命党 ·····	224
第一节 自立军与革政派·····	224
第二节 兴中会与维新派·····	233
第三节 江岛人物·····	243
第四节 应和与纷争·····	253
第六章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 ·····	262
第一节 不约而同·····	262
第二节 使节与异人·····	270
第三节 民为邦本·····	286
第七章 新加坡华侨 ·····	293
第一节 邱、林、徐、黄、力·····	293
第二节 捐款与定策·····	302
第三节 因嫌生隙·····	311
第八章 岑春煊与保皇会 ·····	322
第一节 护驾潜因·····	322
第二节 戴后与助帝·····	328
第三节 互为奥援·····	334
第九章 秘密社会	
——南海西樵巨盗区新·····	345
第一节 盗与官绅·····	346

第二节	盗任官责	354
第三节	勤王军将	359
第四节	死而不靖	365
第十章	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	374
第一节	组织	374
第二节	事业	378
第三节	镜湖茶谈社	384
第四节	参与革命	391
第五节	内外分歧	396
第十一章	保皇会的暗杀活动	402
第一节	复仇复辟	402
第二节	勤王辅助	406
第三节	再向京师	415
第四节	渐入下流	424
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	429
第一节	变法与自主	430
第二节	复辟与革命	435
第三节	勤王与民政	447
第四节	讨满与保皇	452
第五节	余波回澜	467
第六节	种豆得豆	478
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	486
第一节	港澳二何	487
第二节	港澳总局	499
第三节	内外关系	506
第四节	商务公司	521
第五节	港澳与滨沪	537

4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

第六节 保皇大会·····	555
第七节 难得善终·····	569
征引文献·····	581
人名索引·····	597
再版后记·····	615

绪 论

—

人生有缘。生长于人杰地灵、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偶然机会，到过雁山公园。在风景如画的环境里建造园林，胜意处自然只能求诸山水之外。当时羡慕的是园中一株既高且大的相思古树，据说十分名贵，后来才知道那座园本是晚清名臣、民国元老岑春煊的一处私宅。几十年过去，园主已然成为游园少年研究的对象。

1993年在日本访问研究期间，曾由久保田文次教授引导游览镰仓江之岛，霞光水色，景色绮丽，令人胸襟一阔，特意请十分熟悉近代中国人在日本活动史事遗迹的久保田教授指路，来到岛上的金龟楼前流连片刻。1899年7月，梁启超等12人结义于此，有心反清，并与乃师康有为立异。光阴似箭，百年将过，人去楼非，只有楼名依旧。斜阳之下，令人顿生几分苍凉，无限感慨。这两件事，或无心，或有意，由一缘字连接，百年时空，刹那接近。

研治庚子勤王史事，开始可谓误打误撞。本来师友相邀，分工合作，撰写一部较为详尽的孙中山传记。因为前此参与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分得1895—1905年部分，这一段自然归我起稿。用数月之功，得十余万字，将乙未至庚子一节草就。但渐渐发觉，比照新出材料，既有思路破绽百出，难以弥缝，于是抛开原稿，不循旧路，重新由解读材料入手，以去心中疑惑。因为有了前段的教训，对于新旧材料的区别以

2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

及旧说与历史本相的差异,感觉格外敏锐。通过比勘参证各类新旧材料,相关人事及其复杂关系逐渐清晰,历史本相的脉络轮廓日益显现。当时隐隐察觉揪住一桩历史大案,剥茧抽丝,可以发覆。不曾想仍须再用十余年苦功,才能大体作一收束,并且不少问题还须留有以待。治史之难,局外人何尝能够体会万一,其中的艰辛与乐趣,何足为外人道哉。

二

治史首要,在于史料与问题的配合恰如其分。就史料而言,应恰当把握新旧材料的关系。近代学人多偏于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一味重视发现新材料,而置基本史书史料于不顾,难免离开大体,纠缠枝节,失之于隘,最终陷入凿空蹈隙的偏窘境地。只有熟悉既有史料、基本史实与研究对象的整体,才能将新史料安放于适当的位置,并据以判断研究的进展是否恰当。而没有新史料的发现,一味用后来外在的系统条理对现成史料与问题重新解释,也容易翻云覆雨,流于牵强附会。^① 研究晚近史事,上述规则尤为重要。

治学途则,一为先因后创,一为不破不立,前者可以得道,后者易于成名,恰如武侠小说中练习正宗武功与旁门左道之别。晚近以来,学人多以打倒前人立异,然后借助根在外面的西学竖起标杆,以代际兴替之名,行派系分立之实,独树一帜,唯我独尊的大言之下,不过想争取一定的生存空间。以当下的时髦语,便是要取得话语霸权。而群雄并起,各不相下,均将一孔之见放大为整体趋势,反而导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暴雨横潦,难得持久,易于过时。其实,国人竭平生之力以治

^① 参见拙文《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161—191页。

中学,尚难识大体,游学海外,除陈寅恪等少数遍学者外,大都只得一端,甚至只得一学位而已,更不用说通过交流与国际接轨而来的道听途说,或读西书摸着石头过河的个人体验。盲人摸象,不得不以偏概全,又急于贡献于国人,只好放大本位,以欺世而自炫。即使侥幸遭遇学术主流,而以欧洲为中心的学术思维又大别为人本与科学两大流派,定期轮回,用于欧美得其所哉,移植中土则未必适宜。费孝通教授晚年回顾其经历的三大导师,反而对史禄国赞词稍多,决非同情弱者。^①

就此而论,近代学人善于以革命手法争取话语霸权者,首推梁启超,20世纪初年他在思想学术各个领域吹起的一阵革命狂飙,不仅令广大青年感到振聋发聩,许多饱学之士也是耳目一新。然而,后来梁启超却深自忏悔,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一段语重心长的自我解剖: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彼尝言: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

^① 参见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

4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

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①

梁启超的这番话，悔其少作之余，也不乏针砭时势之意。五四新文化时期的胡适以及新文化派，在治学途径的大体方面显然步了梁的后尘。梁启超逝世后，缪凤林为文悼念，就曾直言不讳：“今日者，不学逞臆之夫，肆其簧鼓，哗众取宠，亦且因缘时会，领袖群伦焉。吾人惓怀梁氏，尤歔歔慨叹而不能自己者已。”^②今人常常叹息学术不兴，并多方面查找原因，鄙意以为，与其说是借自外国或相关学科的框架不佳，不如反躬自省，主要问题恐怕还是出在百年以来学风流弊，治史者越来越不会研究历史。所谓邯郸学步，反失其本。

今人读史，常呈现一怪相，若不借助于后来外在系统，则几乎无法读懂材料，或者说不知材料有何意义。而一旦以后来外在系统为指导，又难免观念先行，肢解材料本身的联系与意思。也就是说，今人的问题意识，往往不从材料及其所记述的历史而来，而由后出外来的理论而生。对此学人有所争议，或以为凡问题皆后出，无所谓陷阱。不过，治史先要探究问题如何从无到有，并教人如何从无到有地去看，否则，一切史事皆只有必然性的一面。果真如此，治史于人类的自我认识将变得毫无意义。

导致上述怪相的要因之一，是中西冲撞下的社会文化变形，以及随着社会分工日趋精细而来的学术分科的日益细化。由细分化训练出来的学人中西两面均只得一知半解，甚至一科一段的知识也难免门户之见，更不用说望文生义的格义附会。而学人越是不识大体，越是敢于放大大一孔之见，所谓盲人摸象，坐井观天。细分化所造成的学术侏儒化，导致学术领域的无序竞争，各人既然分不出高下，索性就不分高下，且

^①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65页。

^② 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119页。

自我开脱,美其名曰见仁见智。学不成则术大行其道,用种种非学术手法将有限的所知放大为整体,以误导判断力和鉴赏力不足的青年乃至资源掌握者。晚清以来的中国学术,不断趋时,又不断过时,症结之一,就在于此。

今人关于近代中国史的许多观念,建立在似是而非的史料史实之上,好比沙上筑塔,难得稳固。而历史教学又一味偏重于灌输知识,将教科书当作历史。实则若教以如何认识历史,则历史不仅丰富生动,而且富于智慧。否则不仅索然无味,最多谈资而已。结果后学者学得不少套话,看不懂材料本身的意思,却讲了许多“言外之意”,翻来覆去,对历史的认识根本得不到深化。尝戏言以中国学人之众,若下功夫精研各自专攻,后人与外人恐怕难有下嘴的余地。可惜学人不愿下笨功夫,甚至不知如何下功夫,底盘不稳,又好高骛远,但以轻功,如天马行空,高来高去。看似飘忽不定,实则原地踏步,进展甚微。加以学问以外的种种影响,令学人分心于术而不能倾心于学,成就难得较已有为大。或许人多畏苦,又欲名利,只好借助于术,于学反而有害无益了。由此圈内外人对于学术渐失敬畏之心,因为不知深浅,也就无所谓高低。

不知古今中外学术渊源流变的大势主体,凡事截断众流,横逸斜出,不妄者几稀。连技术层面的东西尚未掌握,就试图独辟蹊径,自习则误己,教人则害群,放言高论,更加自欺欺人。若自以为是,开卷即立意超越前人,不看前人书,或但以己意度之,以为有思想出新意,不知尚在前人笼罩之下,甚至未及前人已明之事理。所谓著述,不过将古文变成时文,以唾余为发明。自晚清学人以“中国无史论”将既有史书打入另册,^①中国似乎只有史料而无史书,只有官史,而无民史。在“新史

^①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对此有所论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165—196页。

学”的框架下,历朝历代之史均需重起炉灶,研究者似乎处于同一起跑线。可是,尽管新史学以不破不立将新旧学术截然分开,治学必须先因后创的规则依然制约着学术发展的进程。整体而论,接续既有传统的人文学科较移植而来的社会科学程度略高;就史学而言,国史与外国史差别甚大。至于本国史,上古部分经历清代学人由经入史的全面整理,基础较为扎实;中古部分由海内外前贤倾力相注,又得史料之多寡与立论之难易配合适当之便,很快走上正轨,养成循正途而守轨则的专业自律,虽然这两部分也存在不断用外来框架重新条理本土材料,以及褒之则附庸蔚为大国,贬之则婢作夫人的偏弊。而晚近史一方面背负繁重的史料,另一方面其发端又主要是为了解决学术以外的社会问题,结果对于史料的重视以及运用史料的慎重,反而有所欠缺。于是只能较多地依赖于外来的解释框架,以便将有限的材料组合成条理系统,解决材料纷繁和缓不济急的难题。如此一来,所建立起来的“大体”,难免存在与史料史实不相符合的诸多问题。

要克服此类弊端,一般以为应当求助于宏观,即变换解释系统。实则凡后来与外在系统,均与当时当地不相啻纳,强求则势必削足适履。此虽为近代以来欧洲以外文化系统普遍面临的不得不然的尴尬,如果没有充分自觉,容易误将后来外在系统当成历史的本相,本末倒置为研究的前提。当务之急,反而是不可操之过急,只有对大量史料史实进行具体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归纳或总结出所谓一般。今人常说治史不能仅仅求真,其较高一级的目标当是寻找规律。其实二者本来统一。规律者,事物之普遍联系也。治史所凭借的天然时空联系,与逻辑联系往往一致,环环相扣,无限扩展。而且求真不仅要实事求是,更可以深入心境,探寻心路历程。求真的过程,适为不断延伸地解开个人、社会与自然连环相扣的普遍联系。在此过程中,规律将逐渐显现。

以此为淮的,中国近现代史可以拓展的空间十分广阔,即使过往重点研究的部分,也大有深入的余地。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近代中国号称

史料大发现的年代,因此前贤提出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预流。虽然就声势影响而论,甲骨、简牍与敦煌遗文最为显赫,但无论数量之多还是种类之繁,清代以来的晚近史料无疑最为巨大纷繁。除了数以万计的各种刊印书籍之外,还有中外公私藏档、报纸杂志、函札电稿、日记年谱、家族系谱、契约文书等等,其数量远远超过历代文献的总和。其中相当大量的部分属于未刊,或是根本不欲示人的秘籍;有的虽曾刊行,但流通量小;有的当年流行一时,时过境迁,已成难得一见的稀世珍本。目前所据条理系统,是在这些史料大都未曾寓目的情况下,利用可见片断,依据后来外在理论的逻辑系统,发挥想象,以点成面,因陋就简勾勒而成。其因应时势需要的历史作用自然不可低估,但联想与历史是否吻合,还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与解读。

三

近二十余年来,相关资料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出版或公布开放,可谓再一次史料大发现。而且与前此不同,除了浮出水面者外,学人还注意到水面以下冰山的巨大。例如学人素以《越缦堂日记》《翁同龢日记》《湘绮楼日记》和《缘督庐日记》为四大日记,以凸显其关系近代史事的重要,而近年出版的多种日记,于近代史事的重要性决不在四大日记之下,甚或在其上。据说这一时期已知未刊的日记稿本至少逾千种,其中不少以主人的地位而言,重要性亦复与上述相近。时势也为学人提供了可以从容向学的外在环境,不必仓促应急。两相配合,逐渐发现,以往所勾勒的线索脉络与历史本相之间颇有距离,有的甚至为假象所遮盖扭曲。如果充分解读史料,不为成见所囿,晚近历史的各章各节大都可以重新改写,有的恐怕将变得面目全非。其中以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中心的历史尤其典型意义。

康、梁一派活跃于历史舞台中心的时期,主要是戊戌与庚子。康

有为是以公羊学疑古的大家,相信史学之于政治有着密切关系,自然重视历史记忆影响后世的巨大作用。梁启超则是“新史学”的倡导者,知道改变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改写历史。戊戌政变后不久,梁启超就写了《戊戌政变记》,以当事人的身份对那一段历史作了记述,成为后来学人研究相关史事的重要依据。然而,梁启超的记录并非历史真实的完整影印,其中不仅因为立场利害的关系,对于诸多事实的陈述带有一面之词的偏见,而且出于后来某些政治目的的需要,有意掩饰或扭曲真相,使得历史记载适合其当下的政治需要。^① 1920年代梁启超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曾直言不讳:“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②

所谓感情支配,还可以说是无心之失,更为严重的是,康、梁等人常在材料上大做手脚,使得文献的主次真伪发生混乱。因此,研究戊戌维新的历史,必须综合比勘朝野上下禹内海外各派人物公私明暗的种种记录,不仅注意材料署明的时间,还须注意材料何时问世及其保存和公布的背景。近年来,随着相关资料的陆续披露,其不尽不实之处逐渐显露,一些学人对于某些问题作了认真探究,还有许多背后的东西尚未得到澄清,需要等待更多的新材料,或是对新旧材料作进一步的梳理。历史的本相究竟如何,目前还宜粗不宜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许多方面与康、梁的描述大相径庭。

^① 参见杨天石:《康有为“戊戌密谋”补正》,《文汇报》1986年4月8日;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②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第91页。

四

如果说康门师徒旨在通过重述戊戌变法的历史来突出自己,贬抑他人,对庚子勤王则刚好相反,极力掩饰其在武力行动中实际扮演过的主角作用。

庚子年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作为新旧世纪的转折,本来世纪末情结就容易引起普遍的焦虑,加上一年多前为中国带来一线生机的变法革新不幸夭折,全社会还在倒行逆施的压抑与痛苦中挣扎,新与旧的矛盾冲突使得政治天平不断向保守的一方倾斜。这一变化所引发的严重问题之一,便是中外矛盾的激化。由保守派官僚掌控权力的清政府试图利用义和团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结果导致列强联手入侵,中国陷入空前的亡国灭种民族大危机。当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两大难题,其一,避免瓜分和奴役;其二,扭转倒退趋势,重上革新轨道。对于前者,北方的义和团只是本能地反抗,能够将中国从深渊的边缘挽救过来的希望,还须通过后一途径。就此而论,庚子年中国趋新各派在南方展开的各种救亡振兴的努力,手段虽然多样,但均与这一总体目标并行不悖。迄今为止,学人对于庚子的关注仍以北方的义和团为重,而对南方趋新各派的努力,则置于次要或旁支的地位。若从历史发展的方向看,南方趋新各派的勤王运动,其意义远在义和团之上。因为北方的义和团毕竟是民众自发的抗争,而南方的勤王运动则是趋新各派的自觉努力。尤其是各派联合欲在长江流域实行民主变政,更被视为立国之基。这一努力不仅吸引了中国的各派趋新势力,所动员的范围还包括全球的华侨华人,引起全球华人的民族和群体意识的首次普遍觉醒。

庚子勤王,早已受到海内外学人的注目,发表了不少论著,也引起过一些争议。不过,直到1980年代,都是将两湖当作保皇会勤王的基

地,而以自立军为主力正军。^①造成这一误解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康门师徒故布迷局,有意掩饰其以两广为主要活动基地的事实,在此后的记述中,完全回避有关的方略计划与实际作为,极力突出长江流域的自立军。保皇会当时秘而不宣,固然出于形势的需要,后来则对家乡父老不愿承担“惊粤”的罪名,对海外华侨必须展示用款的实效,对朝野官绅还要保持君子的形象。时间越久,改口越难,谎言说多了自己也信,只好弄假成真。包括革命党在内的其他派系成员,鉴于后来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不愿提及当年合作反清之事。

造成误解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革命史的框架之下,保皇派乃至其他维新人士的历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即使有所涉及,也用固定的眼光对待,成见过甚。康有为、梁启超之于近代中国的影响之大,与现有的研究状况完全不相匹配。至于众多的草堂弟子,关注研究者更加鲜少。因此对于有关人事的追寻探究,相当困难。保皇会当年隐秘的各种文献,偶尔也有传布于世,如张篁溪编《自立会始末记》下卷所收康有为

^① 参见菊池贵晴《唐才常的汉口起义》(《福岛大学学艺学部论集》4,1953年)、《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历史研究》第270号,1954年)、小野川秀美《义和团时期的勤王与革命》(《清末政治思想研究》,ササギ书房1969年)、手代木公助《戊戌至庚子期间革命派和变法派的交涉》(《近代中国研究》7,1966年)、李守孔《唐才常与自立军》(《中国现代史丛刊》6,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版)、汤志钧《戊戌改变后的唐才常和自立军》(《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金冲及《略论唐才常》(《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皮明庥:《唐才常与自立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庚子勤王运动,虽然从1950年代开始,相继被国内外学术界视为从维新到革命的转折点而受到重视,基本格局却长期误以汉口自立军为中心。有关研究迄今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50—1960年代,日本的菊池贵晴、小野川秀美、手代木公助及中国台湾的李守孔等围绕自立军事件撰文探讨从变法派转换到革命派的发展过程。1970年代末起,中国大陆学术界改变以往对维新派以批为主的态度,承认唐才常的自立军是迈向革命运动的一个里程碑。汤志钧、金冲及、李泽厚、皮明庥、蔡少卿、胡珠生等人分别探讨了有关人物和问题。1990年代开始,在解读197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或公布的中国、日本、美国、新加坡有关保皇会和革政派士绅的新资料的基础上,国内外学人陆续发表了一批论文,庚子勤王运动的真相逐渐浮现。